

烟火茉莉

□廖天元

高考成绩发布的当晚，妻收拾妥当后照旧给窗台的茉莉浇水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天空，伴随几声隐约的炮响，骤然升起朵朵绚丽的烟火。

妻的手微微一颤，壶里的水从花盆径直洒向地面。我赶忙上前接过她手中的水壶，让她坐下。我知道这个一向坚强的女人此刻是脆弱的，望着天空象征胜利与狂欢的烟火，她的内心必定五味杂陈。

人的情绪是有开关的，妻的开关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。对妻而言，高考是一枚苦涩的果子，即使岁月流逝，她也没有把它转化为风轻云淡后的淡定。

妻自幼便是人们口中“别人家的孩子”。小学毕业升初中，她轻轻松松摘得全乡第一名；初中毕业后，岳父让她填报中师，她又毫不费力地考了全县第一名。然而此时，妻已萌生走出大山、告别家乡，去探寻全新生活的想法。

拿到师范录取通知书的妻，最终并未去报名，她向岳父表明自己渴望上高中学音乐。后来，妻告诉我，当时岳母抽出一根桑树条，狠狠抽打她，边打边骂：“供你读书这么难，你怎么想学那些没用的！”无助的妻没有躲闪，也不哭，任由母亲发泄，直到她的鼻血涌出来，滴滴答答落在灰白衬衣上。岳母见状慌了神，赶忙骂骂咧咧去厨房舀水。

岳父说：“那你去读高中，考不上大学就回来嫁人。”妻咬着牙应道：“行！”

就这样，妻放下那张师范录取通知书，转身走进县城那年唯一一个艺体班级。

妻子的音乐梦由来已久。当年岳父买了许多磁带，妻跟着家里的录音机，不知不觉学会了唱《轻轻地告诉你》《冰雨》……暑假去姑姑家，师范毕业的姑姑教她音符音阶，不到一上午，她便能有模有样地弹奏自己会唱的歌。

姑姑给她大哥打电话，夸赞侄女如何灵气。不料岳父却呛道：“唱歌就不用吃饭啦？以后吃不上饭谁管她一辈子？”姑姑捏着电话听筒，听着那边岳父的冷笑，手气得直抖。“这孩子灵气，不学音乐太可惜了，亏你还是老师，思想这么保守。”

妻上高中后，岳父每月给她两百元生活费。她每天早上吃一个馒头、一碗稀饭，晚餐亦是如此，一周才吃一次肉，省下来的钱都用来报名学钢琴。

高一平穩度过，妻的琴技日益精进。没想到高二时一个“意外”差点又让她的音乐梦破碎。

那个学期，妻排名全年级第27名，其中语文143分，作文被火箭班的班主任当作范文朗读。老师们坐不住了，一个文考成绩总在年级50名以内的学生选择读艺体本就让他们难以理解，如今这27名的成绩，更让他们明晃晃觉得是“暴殄天物”。火箭班的班主任找到妻，直言让她转班。妻低着头不表态。老师见状说：“这样吧，把你父亲叫来，我跟他谈。”

岳父接到电话，以为妻在学校闯了祸，心急如焚地赶到学校。没想到，老师对他又是泡茶又请坐。最后，

老师对岳父说：“只要你女儿来我班，直接奖励五千元。”岳父有些心动，这五千元意味着女儿读完剩下一年半的高中，家里无需再负担一分钱。岳父找到女儿相劝，可妻依旧坚决不从。他脸色铁青丢下一句：“我不管了！你自己看着办！”便转身离去。

后来，我问妻，对那五千元真的没动心吗？妻眨眨眼反问我：“你猜猜？”我当然会装糊涂。

岳父虽满心不悦地回去了，但每月的两百元生活费仍按时打来。妻依旧每天早上一个馒头、一碗稀饭，晚上同样如此，一周吃一次肉。

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，妻要去省城冲刺培训，出发时间定在大年初六。

初五夜里，家里气氛格外凝重。

岳母沉着脸训妻：“人长得那么难看，学什么音乐？”岳父沉默许久才开口：“我觉得你声音条件一般嘛！”妻憋得满脸通红，始终一言不发。岳父撂下话：“你自己去培训，家里反正没钱。”

妻回到房间，咬着被子痛哭。哭累了，起身默默收拾了几套换洗衣物。她和同学约好，凌晨五点，同学一家开车来接她，到时候闪一下车灯就行。

离开家时，妻轻轻推开门，她特别害怕木门吱吱叫的转动声惊醒父母。

同学的母亲见到这个孩子，一时难掩心中诧异。她的女儿应该早已将妻的情况告知，并表达了喜欢和敬佩。这个要强上进的孩子，由此在她心中有无数模样，却怎么也没想到眼前的姑娘如此狼狈。出于母性本能，她一把抱住妻：“走，我们去买衣服！从此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！”

一向坚强不爱哭的妻，听到这话，瞬间泪流满面。

妻在川音找到高中时的师姐，借住在学生宿舍。她跑到花市，花一元钱买了一盆小小的茉莉，放在床前。她摩挲着粗糙的陶盆，满心欢喜，那是省城寒冷的冬天里，唯一值得的期待。

试训时，教授让她唱歌，她一开口，教授立刻被妻的嗓音吸引，但教授一眼看穿妻的窘迫，说：“别人在我这儿上课，两百元一节课，你交一百元就行。”

不难想象，当年的妻听到这话该是何等震惊。她身上总共不到三百元，这还是从每日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中省下来的。交了培训费，自己怕是要挨饿了。

妻鼓起勇气望着教授：“老师，我能不能以后再给您？”说完，她低下头，紧张地等待“命运审判”。

时间仿佛凝固，每一秒都那么漫长。当妻再次抬起头，听到教授说了声：“可以！”她松开早已褶皱的衣角，手心全是汗。

没想到，教授给其他学员上课时，常叫妻来旁听，偶尔还让她做示范，借机指出问题。唱得好时，教授对其他学员说：“看，这才是正确的唱法！”

说是集训，教授只单独给妻上了四节课，还是在专业考试前一周。但妻明白教授每天都在用巧妙的方式

教导她，还细心呵护着她的尊严。

这个细节，从此让我对“教授”两个字心怀感恩。有一年我问妻，这些年过去，是否还记得教授模样？妻说：“当年他四十多岁，微胖，头发稍卷，浑身透着艺术家的气质。”

“钱后来给教授了吗？”

妻依偎着我，一时没说话，后来我明显感觉她的声音发颤：“考试结束后我想去找他报喜，可师姐说他已经调走了。”

妻的成绩在多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揭晓。文考和专业分数相加，远超当年川音的录取分数线。

然而，妻不敢奢望。离家最近的一所师范院校，以“最诚恳”的价格吸引了她。姑姑给了她四千元，她小心翼翼地揣着，义无反顾地走了进去。从此这个女子拼命学习挣奖学金、教人练琴、做家教，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。

直到那个奇妙的夜晚，我做完家教从一栋楼出来，看到一个姑娘也在等车。我们瞧见彼此身上的校服，为省钱决定一起步行回校，就此相识。她递来的纸条边角起毛，BP机号码旁画着茉莉——像极当年她练琴时的音符。

谈恋爱时，我对妻说：“你的过去我未曾参与，你的未来我风雨兼程！”她温柔地笑着：“有些遗憾，老天会换一种方式补偿。”

我知道，妻这话，一部分指的是与我相识，但她确实有着难以释怀的遗憾。当年接送她、陪她考试的同窗好友考上了川音，后来自己开了琴行。有一年，好友向已工作的妻借钱，可妻上一个月刚把仅有的三万多元打给家里，身上只留了六千多元。好友借钱时，妻说暂时转五千元，却因此被误会不知感恩，两人从此形同陌路。

妻当年没告诉我这些，她说：“不想因为钱的事，让你为难。”

不得不说，妻深爱着我，可她的倔强与隐忍，也时常让我心疼。

窗外的烟火渐渐稀疏，夜空重归宁静。妻子靠在我肩头，目光依然停留在那盆茉莉上。月光下，洁白的花朵静谧地绽放着，仿佛从从未被方才的喧闹惊扰。

“看烟火的时候，你在想什么？”我轻声问道。

她沉默片刻，指尖轻轻抚过茉莉的叶片：“想起些年我的‘放榜日’……想起老家到县城那条望不到头的山路，想起省城冬天冷得刺骨的琴房，想起教授说‘可以’时，我松开衣角手心全是汗的样子……也想起那个没有说声谢谢的清晨，还有……那个越走越远的朋友。”她的声音轻柔，如同茉莉的幽香，“这些烟火，是别人家孩子的庆功宴。而我的路，就像这茉莉，在寂静中默默积蓄力量，熬过寒冬酷暑，才开出花朵。”

我握紧她的手，久久不语。窗台的茉莉在夜空中捧出一簇簇新鲜的雪白，它谢了又开，开了又谢，绽放时悄无声息，却将所有的挣扎、倔强与尊严，都沉淀成满室芬芳。

父亲那些鸡零狗碎

□吴华

时光匆匆，父亲离世已三十年了。然而，他的音容笑貌却宛然如昨，尤其是在节日时，父亲的身影更会频繁在我脑海闪现。或许，这便是每个人生命中的宿命吧，即便年至耄耋，对父母的情感仍会如初。

——

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近乎完美，他勤劳、善良、上进、正派，总是尽心尽力地引导子女踏上人生正道……在他身上，似乎很难找到一丝瑕疵。但有一件事，却让我对父亲的好印象大打折扣——父亲打死自家狗的事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原谅他。

在农村，养狗是再平常不过的事，每户人家的狗都有名字。我们院子里，大伯家的狗叫“黑儿”，三叔家的狗叫“赛虎”，老八叔家的狗叫“黄儿”，锅盖家的狗叫“干叫叫”……那些关于狗狗的往事，总是令人心生感慨又难以忘怀。

其实，狗的性格与主人的性格颇为相似。我们家养的狗，就没有别人家的狗那般“恶、凶、阴险”。

赛虎凶悍无比。一旦有人路过三叔家，它便上蹿下跳，狂吠不止，甚至还会往路人身边蹿，把人吓得够呛。黑儿则阴险狡诈，它会悄无声息地蹿到你身边咬一口就跑，或者狠狠撕咬你一口后，再跑到远处狂吠，仿佛被咬的不是你，而是它。这种狡猾的狗，最让人害怕，也最让人厌恶。至于狗的性格与主人家是否相似，小时候未曾思考，但长大后，便明白了许多道理。

我记忆中，家里曾养过几条狗。除了大姐出嫁后不久走去的那条帅气的黄狗外，最后养的是一条白黑相间的花狗，父亲给它取名为“花儿”。花儿长相普通，但很忠诚。我读书回家时，它总会跑到我身边，摇着尾巴，十分亲热。尤其是我读师范期间，长时间未回家，我还没进院子，它就会跑来迎接我。

这条狗养了多少年，我已记不清了，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。它与我们共度了最艰难的时光，如家庭成员一般，与我们同甘共苦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条有情有义、父亲却因身为生产队长，要带头打狗，而不得不将其打死。那时我在县城读师范，没有机会阻止父亲大义“灭亲”的行为。我已记不清是寒假还是某个周末回家时……反正我一回家，母亲就把煮好的狗肉给我吃，说是专门留给我的。我十分惊讶，不敢吃，也不想吃，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反感。我一度对父亲心生怨恨，他为何要这样做。

我后来才知道，父亲作为生产队长，他是在执行上级的指示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全生产队的打狗任务就无法落实，他也会受到批评，甚至可能挨处分。父亲打死自家的狗，实属无奈之举。有了这样的想法后，我便逐渐原谅了父亲。

从此，我们家再也没有养过狗。

——

读师范时，有一次寒假回家，我经历了一件特别奇怪的事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懵懵懂懂，不明就里。因为不明白，也不敢轻易询问父亲，再加上母亲经常责怪父亲，我就更不敢轻易去问了。

这件事直到父亲去世多年后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有时我真的很愧疚，未能在心理上给予父亲支持，让他如此孤单。

父亲是生产队长，在农村人眼中算是当官的。我也因此被戏称为“官二代”。作为生产队长，队里的大事小事，父亲都会管。即便不归父亲管的事，也会找到他。似乎父亲是这个生产队的大能人，什么困难都能解决。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，父亲还会遭到辱骂。如今想来，父亲这一生过得真的很可怜。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，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，他不过是上传下达罢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对农村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，后来大姐当上了大队书记，我才更深刻地体会到农村干部的不容易，也似乎更能理解父亲当年的处境了。

记得那是我读师范的最后一年，家中经济最为困难。有时我需要生活费，父亲还会去别人家借钱。如三叔是个剃头匠，生活比我们家稍微宽裕一些，父亲硬着头皮说好话向他借钱。父亲最难以启齿的就是家里缺钱，向别人“下矮桩”。因为大姐、大哥、二姐相继结婚离开或分家，母亲又因右臂长了一个毒疮，烂了将近半年，四处求医问药，都没有解决问题。母亲在病床上的呻吟，一次次撕扯着父亲的心。他不是医生，无法为母亲减轻病痛，也不是能挑重担的人，无法为母亲分担一丝重负。

母亲的病是怎么好的，我不得而知。大概是拖着拖着，病情慢慢好转，而大家的注意力也渐渐转移了。如今想来，真的是心痛，我那苦难深重而又可怜的母亲！

——

有村民到我们家吃住的事，直到父母去世，我都未曾问过。记得刚从学校回家，就发现家里来了客人——一对母子，孩子只有几岁。母亲拖着病体，全靠左手劳作做饭。家里母鸡下的蛋，父母向来舍不得吃，母亲却拿出来煮好，给那个孩子吃。饭中一般都会混着红薯或洋芋，但因为是客人，是村民，母亲忍着病痛也要顾及情面招待他们。

当然，这也是母亲后来经常与父亲吵架的原因：“当个生产队长，净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弄到家里来，哪有那么多粮食招待他们，自己家都不够吃！”

是的，父亲知道，有些村民没有吃的，跟我们家没关系，是他们自己不劳动，导致上顿不接下顿，一旦没吃的了，就找理由到我们家里来，哪有这样的道理？

那位带着小孩的妇女在我们家吃住了一周才走。想来，难怪家里没有钱供我读书。父亲这个生产队长当得实在窝囊。后来，我也跟着母亲一起埋怨父亲，怎么不拿出魄力阻止这样的事发生。可父亲永远用沉默应对我和母亲的责难，或许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使然。他作为一名生产队长，队里的人吃不饱饭，他似乎觉得这就是他的责任；人家来吃、住，他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善良和担当，是父亲固有的本性，直到他生病去世，都没有改变过。

但这些都没用。我出生的地方，是个既不靠山也不邻水的浅丘之地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外出务工的人还不多，大家都靠包产到户的那几亩田地生活，一家六七口甚至七八口人，稍不计划好，一年的口粮就不够。

在我家吃住了将近一周的那对母子，我们后来才知道，是她家揭不开锅了，借着家庭矛盾，带着孩子到我们家来告状，让父亲帮忙解决。俗话说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父亲无法帮忙解决，就让母亲煮饭招待他们，让她消消气后，等其家人来接，或自己消消气再回家。

其实，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。这样的招待，对于同样没有多少口粮的我们家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母亲的抱怨是有道理的。面对窘困、无助与无奈，父亲只能任由母亲训斥。

按理说，这些在我们家混过饭吃的人，应该感激我的父亲，毕竟父亲一片苦心，没有白费，也没有白挨母亲的痛骂。可事实并非如此。

父亲因病去世后，有些人不但感激，反而诬蔑父亲贪污了生产队的钱，这让我至今都义愤填膺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乡村正经历从集体制向个体经济的转型，信任体系在利益冲击下摇摇欲坠。一个无山无水的地方，一个上传下达为乡亲服务的生产队长，一个和大家一样靠几亩田地吃饭的生产队长，竟被人家诬蔑贪污，这是多么大的羞辱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那些冤屈也渐渐淡了。因为从下到上，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对父亲有过半点批评或处分，我也渐渐明白，那些流言蜚语都是无稽之谈。只是常常痛恨命运对父亲的不公，勤奋上进、正直善良的父亲，当过木匠、开过手扶式拖拉机和中型“翘屁股”拖拉机、承包过酒厂，却在五十二岁时，被病魔无情地带走。这是他不甘心的，也是我们痛心疾首的事。

父亲的离去，给我们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和打击。尤其是母亲，精神几乎彻底崩溃。此后，贫穷与苦难伴随着我们好些年。

这些与父亲有关的鸡零狗碎，何尝不是命运在乡村投下的影子。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早已注定？这是我活到父亲当年这个年龄时，常常思考的问题，也时刻提醒我，该如何度过一生、教育下一代……



七月的绿意 李彦 摄于遂宁市大樹鎮

小城无锅盔

□庞雨

夜色四合，干冷干冷的。街上人头攒动，车水马龙。霓虹闪烁，仿佛热情的邀请，又如冷风中的寒颤。

小巷边，一只半人高的大铁桶，一张两尺见方的木桌，一团团油浸浸的面团，一盆红乎乎的牛肉，一根手肘般长圆溜溜的擀面棒。千层牛肉饼的辣香、油香、肉香、烤得刚焦而未过的焦香，飘过来，禁不住侧脸一望。

“想吃牛肉饼？”

“不是，想吃锅盔！”

成都红照壁街口，有间小店，专卖锅盔。青瓦房低矮破败，两米左右的门面，一只半人高的大铁桶，一张一米左右的条桌，一团团白生生的面团，一根圆溜溜的擀面棒，手肘般长。铁桶内壁大半抹泥成灶，焦炭火苗幽幽地乱窜，灶沿一圈面饼，被炭火烤得滋滋暗叫。烤着的面饼，就是锅盔。有三种：纯味，面揉活了，擀成径约四五寸的圆饼，炭火烤熟；椒盐味，加花椒面、盐；甜味，加糖。每次走过，都要买一只，边走边吃。

喜欢吃锅盔。锅盔的原麦香里，有雨后原野的泥土清香，有田坎地垄边的青草芳香，经红五月阳光的照晒发酵，注入醇香。咬一口，咀嚼得出时令物候，岁月时光；吃得多，会渐渐涌起满足的醉意，醉眼朦胧处，遍地黄灿灿的麦穗，风一吹，荡漾出丰收的波涛。锅盔憨

厚实壮，仿佛农人隆起的胸肌、臂膀，厚厚的，堆积起稼穡的艰辛，暖暖的，滋润着世事的丰盈，绵绵的，是青春年少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绪。牙间，嘴里，心中，脑际，去了又来，来了又去，滋味纯粹真切。

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

现在，成都的锅盔，都加馅。素的，荤的，荤素搭配的，麻的，辣的，咸的，甜的，酸的，又麻又辣的，又咸又甜的，又酸又甜的，麻辣里带酸的，咸甜里带麻的，甜酸里带麻辣的，只要是吃的，都可作馅，只要想得到的味，馅里都会出现，花样翻新，味道万千。春熙路上，玻璃亭子里的其乐锅盔店前，人潮涌动。每次走过，都要挤进人堆，买一只，边走边吃。

锅盔有两层，电烤箱里烤熟，小刀沿边一划，半边开口，加馅其中。花样翻新，味道万千的馅，气势磅礴，喧宾夺主。一咬，嘴里全是馅味，滋味丰厚，不是真正的锅盔。

在所谓美食之都的成都，到处找真正的锅盔，越找越失望，越绝望。走出四川，走到哪里找到哪里，还是失望，绝望。三十多年，弹指一挥，真正的锅盔，难道消失了？

遇见新疆的饅餅。个头大得出奇，不加馅，炭火

烤，应该是真正的大锅盔吧？买来吃，太薄，太脆，酥油香浓，不是真正的锅盔。

想吃锅盔。想吧！在小城，只能想想。走遍大街小巷，没有三十多年前在红照壁吃到的真正的锅盔，现在春熙路卖着加馅的变相的锅盔，也没有。有的，是号称千层的牛肉饼，先在油锅里煎，再烤，油腻腻的，香是香，却不是锅盔。有的，是小厂加工的泡饼，发酵后蒸好，再烘干，泡酥酥的，有几时的记忆，也不是锅盔。

小城太小，小得连锅盔都没有。世界够大，大得连锅盔也找不着。

有只锅盔，椒盐味的，暖暖地捧在手心，夹杂着泥土清香、青草芳香、阳光醇香的原麦香在鼻翼萦绕。牙间，嘴里，心中，脑际，去了又来，来了又去，纯粹真切里，渗入了丰厚醇香，如十五的明月，温润明亮，清晰可亲。

这是锅盔吗？应该是锅盔，是记忆里的锅盔。好像又不是锅盔，不是记忆里的锅盔。纯粹真切，是时时反刍的青春流年；丰厚醇香，是天天咀嚼的岁月沧桑。

夜色深沉，干冷干冷的。走在小城的街上，想吃锅盔。

“转一圈，找找？”

“不用找，没得！”